

對天然災害受災女性之社會工作 ——一個增強權能的角度

劉珠利

中文摘要

進年來，世界各地，包括臺灣在內，天然災難（natural disaster）或是人為災難（man-made disaster）頻傳，使得災難研究（disaster research）以及災難社會服務工作（disaster social service），成為最近西方文獻資料中備受矚目與討論的議題。在相關的災難文獻中，受災女性的需要，也是許多研究所關心的角度。臺灣現階段針對臺灣天然災難受害女性的相關研究與服務仍然不多，有鑑於此，本篇論文的目的，就是從整理天然災難女性受害者的相關研究中，了解女性的獨立經驗與需要，並針對這些獨特的需要，引用增強權能的取向，討論出針對天然災難受害女性的社會工作實務，期望能夠提供臺灣社會工作者一些啟示。

關鍵字：天然災難，女性，災難社會工作，增強權能

前言

根據 Toscani（1998）的定義，天然災害（natural disaster）意指：地震（earthquake），颱風（hurricane），洪水（floods），火山爆發（volcanic eruptions），以及土石流（landslides）。Toscani（1998）是根據中南美洲的情形所下的定義，在澳洲，常見的天然災害則包括森林大火（bushfire）以及旱災（droughts）（Cox, 1998; Finlay, 1998; Stehlik, Lawrence, & Gray, 2000）。臺灣近年來天然災害頻傳，災害的

種類則是集中於地震，颱風，水災，與土石流。從西元 1999 年的 921 地震開始，以及之後的納莉颱風，及去年（民國 93 年）夏天的敏督利颱風（又稱：七二水災），和艾利颱風，都造成不少的家庭面臨危機或是家破人亡的悲劇。根據臺中縣政府（民 93）回覆監察院有關敏督利颱風七二水災善後處理及安置情形的回覆文中，明確的定出，社工員需訪視所有罹難、失蹤及重傷家戶，以了解個案需求並提供相關服務；又，根據同一回覆文，天然災害受災戶在生活重建過程中所需要的資源，需經

由社工員評估後發放。因此，社工員在天然災害受災戶的協助過程中，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天然災害是社會科學領域中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美國一位長期研究天然災害的社會學家 Fothergill (1999) 認為，天然災害是一個真實的實驗室 (realistic laboratory)，可以從人們經驗天然災害的過程，了解社會現象與關係，從這一類型的研究發現，可以作為將來人類面對及處理天然災害的借鏡，甚至作為避免災害的參考。在社會工作的教學領域當中，天然災害的社會工作服務仍然不是非常成熟，既然社工員在天然災害的救助與重建過程中，扮演重的角色，如何累積這方面相關的知識，並教導學生及在職的社工員，就成為重要的課題。

當研究者檢視西方期刊文獻時發現，目前在西方有關天然災害的研究領域中，有一個新興的主題，就是將性別 (gender) 納入，視性別為一個天然災害中的議題。一位長期研究天然災害的加拿大學者 Morrow (1999) 指出，某一些人特別容易成為天然災害的受害者，甚至是反覆成為受害者，這些人通常是窮人與女性。也有研究指出，女性在面臨天然災害時，和男性有截然不同的經驗，女性感受到心理的壓力的程度比男性為高 (Anderson & Manuel, 1994)；女性在天然災害發生後，都經驗到不同的角色轉變 (Fordham, 1998; Fothergill, 1999; Stehlik, Gray, & Lawrence, 2000)；女性原本在社會上就是位居比較弱勢 (disadvantage) 與脆弱 (vulnerable) 的地位，因此女性在面臨天然災害時，能夠應變的資源與男性就有很大的差異，尤其是有色人種的女性。Fothergill (1998)

及 Morrow (1999) 都共同指出，過去對於天然災害的研究，完全忽略了性別 (gender)，社會階層 (social class)，及種族 (race) 的因素所造成的影響，亦即，這些因素如何加重某些人的受災程度或是減慢某些人的復原過程 (為免贅述，詳細內容將於文獻探討部分，再行詳細說明)。在這一個新興的領域中，上述兩位學者都共同認為，女性主義的概念應該納入研究中，檢視性別，社會階層，種族等因素，在人類面臨天然災害時所扮演的角色。

當研究者查閱臺灣地區各種與天然災害相關的統計數據，例如：93 年中華民國統計年鑑 (民 93) 中臺閩地區天然災害損失，臺閩地區災害救助及醫療補助，以及行政院主計處所統計的民國 92 年臺灣地區各縣市平均每一受災人數接受災害救助金額，都發現所有的統計數字均以受災的程度作為分類的標準，完全沒有以性別作為分類或是救助的依據。這樣的狀況顯示的是，在臺灣天然災害的領域中，性別的因素是明顯的被忽略。

臺灣有關的天然災害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從 921 地震之後，就累積了一些的研究結果。這些已經發表於期刊中的研究主題，大部分集中於面對天然災害的心理衝擊，壓力的應對方式 (coping styles)，受災戶的創傷後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yndromes) 的了解 (李維庭，民 89；林耀盛，民 89；Chen, Hung, Lin, & Tseng, 民 91)，重建過程中的資源分配問題，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社會工作人員在災難服務中的角色與任務 (李臨鳳，民 92；林萬億，民 91；莫藜藜，李易蓁，民 89；楊孝潔，民 92)，及社工員本身的心理衝擊 (陳正元，

民 88)。研究的範圍包括天然災害受災戶的心理調適與所需的資源，同時也包括社工員的心理調適與所扮演的角色。其中，畢恆達(民 88, 民 89)的文獻探討中建議，在處理災害的過程中，性別是應該被考慮的因素；而林萬億(民 91)針對處理 921 地震臺北縣災情的社工員所作的研究最後建議，社會工作的服務必須將受災女性的需要納入考量。然而前述的研究結果中，均未更進一步的呈現受災女性的具體需要，及社工實務的原則為何。

同樣的，研究者在查詢臺灣目前對於天然災害與女性性別角色的實證研究，只發現一篇關於 921 地震喪偶女性單親的社會支持研究(林秀芬，馬小萍，民 93)，研究的樣本集中於了解地震中喪偶女性的經驗。這一研究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檢視，發現地震喪偶的婦女，在喪偶後，對於財產與家中資源的主導權仍然是由夫家掌握，再加上這些山城的婦女工作技能不高，因此在喪偶一段時間之後，即使當時政府給予補助，然而家中的經濟仍舊回到從前，甚至比過去更為貧窮。因此她們的研究最後建議，政府部門在針對災民的重建與預防上，都應該考慮女性的獨特需要。從這一研究中更加證明了性別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然而目前臺灣的研究中就以這一篇是針對女性而作的，對實務工作的建議也有限，因此，研究者認為有關於臺灣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經驗，仍需更多研究探索。

綜合上述的原因，引發研究者從事這個論文的動機。如同 Reyes (2002) 所言，脆弱的人口群(尤其是女性)遭受天然災害的經驗，對於未來天然災害的預防與重

建，有諸多的啟示。因此研究者第一部分整理了中外有關天然災害女性受災經驗，了解女性的獨特經驗；第二部分則是整理一般取向及增強權能取向災難社會工作模式及如何將此模式運用於幫助受災女性；第三部分則是綜合前面兩部分的討論，提出一些實務工作上的建議，期望本論文能夠提供社會工作者一些啟示。

天然災害受災女性之經驗相關文獻：

一、女性性別角色—脆弱與弱勢的社會地位

西方有關於天然災害以及女性性別角色的文獻中，共同都提到女性在社會中位居弱勢與脆弱的地位，因此進而造成對生活的影響。Levine (2004) 指出，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所謂脆弱(vulnerability)的人口意指：缺乏資源與權力以便作出有效決定的人，缺乏資源與權力的原因可能來自外在環境，如：經濟因素，也可能來自人口本身內在的因素，如：內在的適應能力。為何女性在社會中經常位居弱勢的地位？為何女性的弱勢地位，會進而造成女性的脆弱，進而使得女性在面對人生的災難時，有不同於男性的需要？研究者查閱文獻的過程中，發現這樣的狀況並不是因為女性的任何生物上的因素所造成的，多數的研究者都認為女性的弱勢與脆弱，是由女性性別角色的社會化過程與社會所建構的女性性別角色特質所造成的。為顧及邏輯性，因此本段先行探討社會如何建構出女性的脆弱與弱勢地位。相關的文獻，闡述於後：

近年來，由於女性主義的興起，西方的性別研究者開始採取性別角色並不是由

生物因素 (biological factors) 所決定的，而是由社會文化所建構而成的。其中，女性主義大師 Jean Baker Miller 所寫的書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對社會如何建構出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有很詳細的說明。

Miller (1986) 指出，在人類社會中，男性通常扮演支配者的角色，而女性通常扮演附屬者的角色。由於男性掌握權力 (power)，所以男性決定了文化的規範、哲學、道德標準及社會理論等，通常男性所認為的正常的規範或是道德標準，是以男性為主的標準，並且由男性決定女性的樣貌。女性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中，就必須接受由男性所指派給女性的活動或是特質。因此，順從、被動、依賴、缺乏原創性，缺乏行動、思考與作決定的能力，就成為女性的特質。但是事實上這些特質是依照男性規範而塑造出來的，並不是女性「與生俱來」的特質。如果女性違反這些規範，就可能面臨經濟上的困境，社會排斥與隔離。為了生存，所以女性就必須扮演男性所要求的角色。

在這樣的社會化過程中，女性被鼓勵不需要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應該昇華轉化自己的需要，將丈夫以及小孩的需要，當成是自己的需要，將丈夫以及小孩的成就，當成是自己的成就。因此大部分的女性就內化這樣的信念，並將這樣的信念轉化認為照顧別人，參與別人的發展，就是提升自己的自尊。因此，大部分女性的社會化過程都是一種被訓練如何照顧他人的過程，而不是如何發展自己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女性經常犧牲自己，認為自己比較不重要，自己所作的事情都比較沒

有價值，甚至於社會上也瀰漫這樣的看法，因此女性的工作就成為一種看不見 (invisible) 的工作，因為看不到所以就不重要。又因為女性缺乏權力及資源，因此缺乏發展學習生存所需要的技術的機會，而成為必須依賴別人而生存的人。長久下來，相較於男性，由於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較少，所分配到的家庭資源與權力較家中其他男性為少，因此使得女性居於弱勢與脆弱的位置。

Bolin, Jackson & Crist (1998) 及 Waite (2000) 都指出，目前存在於就業市場中的現象是，女性因為教育程度的關係所以只能從事低階技術的工作，因此工作收入就比較低，所能夠擁有的資產就較少較差；另外有一些女性由於必須承擔大部分照顧家庭的工作，因此所能從事的工作就被侷限住。因此即使女性能夠接受教育與加入職業市場，「貧窮女性化」的現象仍舊存在很多的社會之中。Waite (2000) 還指出，女性即使參與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也多數是較不具有權力的角色，所能得到的社會資源也較為有限。所以，雖然比起過去的女性，現代女性得以接受教育與加入就業市場，而獲得較好的地位，然而在進步的社會中，相較於男性，女性在經濟，社會資源等方面的弱勢與脆弱的位置，仍舊是存在的。

簡言之，當社會仍舊是處於父權為主的架構之中，男性掌握了多數的資源與權力，而且不願意和女性分享時，就造成了性別間的不平等；當女性能夠得到或是運用的資源不多，例如：受教育的機會與資源有限，就形成女性獨立生活或是面對問題的障礙，進而建構了女性的弱勢與脆弱。

二、西方有關災難與女性性別角色之相關實證研究

上面段落的文獻討論了女性所位居的弱勢脆弱的社會地位，以及女性重視關係與經常扮演照顧者角色的性別角色特質。根據這樣的地位與性別角色特質，當女性面臨天然災害時，這樣的地位與特質建構出什麼樣的經驗？以下的實證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考。

(一)脆弱的女性容易成為天然災害受害者：

Morrow (1999) 指出，某些社會經濟的特質容易造成脆弱，她運用這樣的概念將社區中的某些人，分類成為天然災害中的脆弱人口，婦女就是其中一群。Morrow (1999) 以發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颶風的地區為例分析：婦女因為所從事的工作屬於低收入的工作居多，所以經濟能力低，使得重建過程中所能使用的資源就少很多；另外，也因為經濟能力不夠，所以原本居住的房屋可能就不是結構良好的房屋，在天然災害中容易被摧毀；婦女所從事的工作是當地家庭幫傭或是地區商家的的工作，當災害發生後，因為原先的雇主也成為受災戶，而使得受雇婦女失去工作；婦女在家庭中的決策權原本就較低，所能參與決定的機會不多，因此有時在天然災害侵襲時，無法立即作出有效的決定，所以易成為受災脆弱人口。

Enarson (1998) 與 Bari (1998) 都指出，遭受天然災害侵襲時的脆弱性(disaster vulnerability)、災害影響(impact)、以及災害重建復原的過程，性別的因素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長久以來女性在社會上弱勢的角色，因而使得女性不斷的累積

脆弱(accumulative vulnerability)，例如：女性經濟條件的弱勢，不得不居住於便宜，但是容易遭受天然災害破壞的地區，使得婦女更容易變成天然災害的受災者。Fordham & Ketteridge (1998) 認為，平日在社會上位居弱勢與脆弱的地位，當天然災害來臨時，就會變的更為脆弱。

Toscani (1998) 指出，並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容易成為天然災害的受災者，但是缺乏資源的脆弱女性，就非常容易成為受災者。因此上述的研究提醒災難社會工作人員，脆弱的女性是特別需要關注的人口。

(二)面對天然災害的經驗，對女性的自我概念，家庭關係，以及社區關係有不同的影響：

Fothergill (1999) 針對 1997 年發生大洪水的 Grand Forks 地區的婦女進行研究，發現洪水發生前、中、後期，婦女們的社區角色、家庭角色以及工作角色，都發生變化，同時，因為所擔任的角色與所負責的工作內容不同，婦女們在洪水發生後，她們的自我概念(sense of self)開始產生變化。舉例來說，洪水發生時，有些受訪的婦女加入了堆沙包的行列，和一群男性一起工作，由於發現自己角色改變，也能成為男性為主的行列中的一員，因此開始肯定自己，對自己有信心。也有婦女加入照顧社區小孩，或是煮食物給堆沙包的工作人員食用，即使扮演的仍舊是傳統女性的角色，但是因為這個任務使得她們能夠和社區中其他成員建立更好的關係，而開始覺得人生比較有意義。還有一些婦女在洪水期間仍然必須回到工作崗位，例如護理人員。然而因為洪水而增加大量的工作，使得她們擔負起責任更大的工作，

這個使命進而讓她們建立對自己的自信心。雖然研究中也顯示，一些婦女從洪水中感受到角色衝突，然而整體而言，洪水對大多數生活於 Grand Forks 地區的婦女，並不全然是負面的經驗。Fothergill (1999) 就認為，天然災害提供婦女經驗不同角色的機會，也因為不同角色使得婦女的內在得以改變。

Fothergill (2003) 的研究中也指出，社會上對於領取社會福利補助的人，烙印 (stigmatize) 下一種標記，意即，領取社會福利補助的人都是懶惰的人。社會上對於天然災害的受災戶，有時候也會烙印下一些負面的印記，認為受災戶就是做錯了一些決定，才會落得這種後果；也有人責怪受災戶，認為他們不應該選擇居住在天然災害高危險的地區，認為他們太不小心才會發生這些事情。但是社會上也是有人對天然災害受災戶抱持同情的態度。因此，Fothergill (2003) 仍然以上述 Grand Forks 地區的婦女為對象，了解她們在遭受到天然災害，並接受福利補助的經驗。結果發現，中產階級 (middle-class) 受災婦女普遍認為災後受助的經驗，讓她們對於自己的中產階級白種女性的認同產生衝突，甚至於覺得難堪，因為長久以來，中產階級白種女性的認同讓她們覺得自己是應該幫助別人，照顧別人，而不是接受別人的幫助與照顧。當她們從自給自足的照顧者變成福利受助者的角色時，她們覺得被烙印下某種負面的標記。然而受助的經驗也使得她們改變過去對於領取福利救助金的人的觀感。Fothergill (2003) 最後認為，性別 (gender) 與社會階層 (class) 是建構天然災難受助經驗的兩大不容忽視

的因素。Fothergill (1998, 2003) 的兩篇研究，明確的指出天然災難的經驗，使得受災女性的內在自我概念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這是實務工作者必須注意與處理的。

Finlay (1998) 以澳洲南部一個經常發生水災的小鎮 Giru 的女性居民為研究對象，了解她們對於當地經常發生水災，經常成為水災受災戶的經驗。結果顯示，受訪對象分為兩大類型，一類認為自己是「受災戶 (victim)」，但是另外一類則不認為自己是「受災戶」，認為這是常見的 (normalized) 現象。Finlay (1998) 進一步發現，經濟狀況，居住時間的長短，有無個人財產上的重大損失，身體狀況，教育程度等，都是影響受訪女性認定自己是否是「受災戶」的因素，教育程度較高，財產損失較多，身體狀況無法處理水災帶來的額外應變工作的女性，容易解釋自己是「受災戶」。因此，Finlay (1998) 認為，對於受災經驗的解釋，和本身的性別角色以及社會階層是息息相關的，而且女性不一定覺得自己是弱勢與可憐，她們在對抗水災的過程中，也扮演了很多男性化的角色，只是當生活恢復平靜之後，世界又成為以男性為主時，她們又回到了女性的位置，所以研究者必須對受災女性的經驗以更多不同的觀點來分析。

Stehlik, Lawrence & Gray (2000) 以兩年的時間訪問了澳洲昆士蘭 (Queensland) 及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遭遇旱災的畜牧業者，發現男性和女性的經驗是有差異的。例如：受訪的女性感受到旱災前的角色僅侷限於家庭，而旱災後為了經濟因素必須外出工作，因此角色負荷比從前多，而這樣的角色改變與

負荷對女性而言，有人感覺是正面，而有人感覺是負面；也有受訪者因為旱災而必須作一些重大的決定，夫妻間的關係因而改變；也有受訪女性將所面臨的問題分為家庭內（inside）與家庭外（outside），家庭內意指照顧家人與作家事，而家庭外意指畜牧工作與記帳等工作，受訪女性認為旱災後家庭外的的工作讓男性感受到極大的壓力，但是旱災後女性不但要處理家務工作，同時要幫助家庭外的的工作，甚至為了幫忙家庭外的的工作，而必須犧牲家庭內的需要（例如：將金錢全數用於家庭外的的工作，小孩也必須犧牲幫忙工作），一些受訪女性對這樣的狀況感到悲傷與壓力。Stehlik et al.（2000）總結認為，他們研究的結果顯示天然災害不光只是影響家庭的財物與資源，還影響了家庭的關係，凝聚力，以及和社區的關係，而女性所受到的負面影響則大於男性。因此災後的家庭關係，也是社工員必須關注的議題。

上述的研究多數看到女性脆弱的部分，而 Cox（1998）的研究結果卻看到女性角色中優勢（strengths）的部分。Cox（1998）以發生在西元 1996 澳洲東南部的森林大火的受災女性為對象，結果發現她們多數是長期住在當地的居民，所以她們擁有豐富的當地者的知識（insider knowledge）。這些受災女性靈活的、有效的運用了這些知識，將村民遷移到安全的地區（因為社區中的男性全加入了滅火的行列）；這些婦女擔負起照顧者的角色，不光照顧家人，還同時照顧村民，並和其他村民建立良好的關係，組織成婦女團體，彼此幫忙。因此 Cox（1998）認為，發生災害的經驗，雖然男女各有不同的經驗與

角色，但是各有其長處，男性重建了架構（structure），而女性則是重建了內在（fabric）。Cox（1998）的研究提醒實務工作者，女性的當地者的知識（insider knowledge），是應該善加運用組織的。

（三）面對天然災害時，女性有獨特的需要，但是救助體系大多忽略女性的需要：

Guha-Sapir（1997）以 1991 年發生於巴格達的地震為例，許多女性為了保護小孩與家中財產而喪命或受傷，而她們在受災中的獨特的需要，也因為她們在社區中的邊緣化的角色，使得她們的需要決策過程中被忽略了。因此，設計整體的防災，救災體系，都應該將性別因素納入考量。

Enarson & Scanlon（1999）以西元 1997 年發生於加拿大 Red River Valley 的洪水受災戶為對象，訪問他們遭遇洪水的經驗。結果發現，在洪水發生的過程中，不論是洪水相關訊息的取得，對抗洪水的準備（preparedness），撤離社區，重要決定的決策過程，以及家園重建等，男性和女性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及負責不同的工作。然而 Enarson & Scanlon（1999）的研究結果發現，在兩性共同面對洪水的過程中，仍然發生兩性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兩性間權力（power）不平等的問題。例如：男性除了因體能的關係，所以負責搬重物的工作之外，男性在面對洪水時，不論是家庭決策或是社區決策的過程中，仍舊握有較多的權力，握有較多的資源，使得女性的需要與意見被忽略或是被排除於外。由於男性掌握了權力，負責的事情屬於「看的見」（visible）的工作，而女性所負責的煮飯，照顧小孩，看管財物等工作，相較於男性的工作，女性的工

作被當成是「看不見」(invisible)的，沒有價值的工作，因此在洪水過後，一些女性回顧經驗，感覺到自己「什麼忙都沒幫上」(I felt like I didn't help at all)，更加深了女性長久以來被父權社會貶低的感覺。在重建的過程中，男性主導重建決策而女性則是執行後續的工作。Enarson & Scanlon (1999)認為這是典型的後災害重建的兩性政治。Enarson & Scanlon (1999)的發現和前述 Fothergill (1999)的發現有些不同，在 Enarson & Scanlon 的研究中，並未發現女性的自我概念從洪水經驗中得到提升。為何同樣是受災戶，然而這兩群婦女會有截然不同的想法與經驗？雖然目前無法從這兩個研究中得到答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受災經驗對婦女而言，不一定是負面的。

西元 1997—1998 年發生於南美洲的聖嬰現象 (El Nino)，造成南美洲天氣型態劇烈改變，靠天吃飯的農民所受到的影響尤其巨大。Reyes (2002)以祕魯 (Peru) 農村地區聖嬰現象受災女性為研究對象，了解她們的經驗。結果發現，受災嚴重的地區原本就貧窮，所以當地有許多壯年男性都離家外出討生活，留下女性照顧家庭，這些女性戶長教育程度不高，所有的資源很少，獲得資源的能力也差，使得災後難以重建。除此之外農村婦女為因應天然災害，所以加入地區的組織，共同為抗災努力；然而政府組織或是中央的抗災組織，仍舊是由男性主導，抗災的政策也都是以照顧男性為主，因此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農村婦女變的活躍，但是實質上所得到的權力與資源仍舊不多，男女不平等的狀況並未因此改善。所以 Reyes (2002)

建議，抗災組織的各個層級，從地方到中央，都應該有婦女加入，才能使受災女性的需要得到照顧。

根據上述的文獻顯示，經歷天然災害是一個連續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災害發生，撤離 (evacuation)，暫時安置 (relocation)，緩和 (mitigation)，以及重建 (recovery)，在每一個過程中，雖然有不同的重點工作，但是女性大多數扮演照顧者及建立與維持關係的角色，然而有些女性在災害前後的角色產生轉變，有人認為這種轉變是正向的，而有人認為是負向的；有些女性對於變成被救助者，感覺到被貼上負面的標籤；有學者認為女性原本弱勢與脆弱的位置，使得她們在經歷天然災害的過程中所作的工作是被看輕的，所能獲得的資源較少，甚至不是她們所最需要的，因此在重建的過程中，女性的復原就減慢很多，災難的長期影響 (long-term effect) 也比較容易發生於女性身上；也有學者認為天然災害還會影響夫妻關係與家庭凝聚力，因此受災女性的自我概念與家庭關係，都是社工需要關注的；也有學者則是看到女性角色的優勢 (strengths)，及這些優勢在重建過程中發揮的功能。總括而言，多數研究仍舊顯示的是，面臨天然災害的經驗中，女性有其獨特的需要，然而女性長久以來的社會位置，使得其需要無法滿足，因此後續的研究，救災體系與政策的制定，都應將性別角色的差異納入考量。

對天然災害受災女性之社會工作——一個增強權能的角度

(一)一般災難社會服務工作的內容：

如同前面所敘述，許多學者將天然災

難的過程分爲：災難發生前的準備期，災難發生時的警告撤退期，臨時安置期，以及重建期。有些學者詳細的列出不同階段的工作重點，有些則是以大原則來討論社會工作的服務內容。從臺灣與西方的已出版的文獻中，社會工作提供災難服務的內容計有：

Zakour (1996) 提出在災難中社會工作的服務應包括：1.結合並動員社區中的資源及志願團體，爲災民提供資源；2.防止更嚴重的身心健康問題產生；3.協助災民建立個人的資源系統；4.發掘多元資源的可近性；5.促使鉅視及微視系統的改變，以促進案主的福祉。

莫藜藜、李易蓁(民89)總結她們在921大地震發生後，進入災區所執行的社會服務工作，可分爲：1.直接服務，包括表達對災民的關心，情緒支持，提供相關的福利資源訊息，接受轉介並對轉介的個案進行預估與處理，創傷症候群的衛生教育等。2.將受虐兒，受暴婦女，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等高危險群，轉介或通報至當地相關社會福利機構，讓他們接受進一步的協助。3.追蹤當地精神病友，關心其症狀的改變，提醒規則服藥與看診，並協助將社區中疑似出現精神症狀的居民，轉介給醫生。4.針對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團體治療，協助他們表達內在想法與情緒，處理內在的情緒，並討論地震後的生活轉變，協助適應地震後的生活改變。

前述的工作內容是以在災區第一線工作社工員的工作內容，但是不在災區的第一線社工員也同樣有其災害服務的工作重點。Sefansky (1990) 認爲一位醫院社工員在災難發生，病患傷者進入醫院之後，

社工員應該以危機處理 (crisis intervention) 以及家庭社會工作 (family-centered social work practice) 作爲工作的重點，具體工作項目則有：1.和不同部門合作，協助辨識傷者的身分；2.家庭社會工作的內容則應包括評估家庭的優勢與弱勢，危機處理，悲傷輔導，媒體輔導，監護權輔導，葬禮安排，倡導家庭隱私權的尊重；3.彈性並有創造性的扮演所有社工員的專業角色，例如：教導者，協調者，資源仲介者，使能者等角色。

上述是一般性的災難社會服務工作的內容，並未以女性爲中心。以女性爲中心的災難社會工作實務應該有什麼重點？以下的文獻可以整體出一些重點。

(二) 增強權能取向的社會服務工作 (empowerment-based social work practice)：

從女性主義的觀點而言，社會化的教條使得女性長久以來，都扮演照顧者的角色，依賴男性的角色；而父權社會中男女權力不平等的狀況，使得女性所完成的工作被視爲是不具價值，而且被排除於任何的權力架構，決策過程之外的。上述的狀況，就造成了今日女性的弱勢與脆弱。換言之，從女性主義的觀點而言，女性在面對困難時，是社會結構造成女性的弱勢與脆弱，因此增強權能就成爲幫助弱勢女性一個主要的社會工作實務取向。

Gutierrez 指出，增強權能意指一個讓案主能夠增加個人 (personal)，人際之間 (interpersonal)，以及政治 (political) 三個方面的力量的過程，案主在獲得力量之後，就能夠採取行動進而改善生活狀況(轉引自 Simon, 1994)。Saleeby (2001) 則指

出，增強權能意指讓案主能夠有能力自己控制與決定自己的生活，實際的作法則是分別增加案主的內在（intra），人際之間（inter），以及政治（political）三方面的力量。Simon（1994）具體的提出，當社工員採用增強權能的取向時，通常扮演三種主要的角色，分別是：照顧者（nurturers），催化者（facilitators），以及倡導者（mobilizers）；照顧者的角色在於幫助案主建立自尊以及健康的認同，並教導案主必要的生存技能，催化者的角色則是幫助案主掃除獲得權能過程中的障礙，倡導者的角色則是幫助案主集體採取行動為這一群案主爭取公平的權益。增強權能的社會工作實務則有下列三項：滿足案主的立即需要，鼓勵案主加入並建立支持網絡，以及在改變的過程中要認可（acknowledge）案主的知識與權威，並以案主為中心（Simon，1994）。Bari（1994）認為增強權能是由許多不同的步驟所組成的，包括：教育，經濟獨立，對自己權益的覺醒，以及獲得政治上的力量；僅處理案主個人層次的問題，並不能全然達成增強權能的目的，還必須進一步的改變社會與經濟環境中，造成案主變成依賴弱勢人口的原因。

Hanmer & Statham（1989）提出了 7 個以女性為主的社會工作實務原則（women-centered practice），分別是：準備自己；發展以女性為主的社會工作實務原則；改善工作方法，讓工作方法更具兼顧性別的獨特需要；讓機構更加聚焦於女性的需要；為女性增加資源；使女性能夠參與決策過程，以及政策制定的過程；為女性主義實務工作建構出倫理守則。

綜合上述研究者的意見，增強權能的主要作法除了幫助案主認可自己的權益，學習生存的技巧，增加案主的資源之外，也必須結合團體的力量，掃除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的障礙，並在政策的制定上，將不同案主的需要納入考量。

（三）增強權能取向的災難社會工作服務：

當增強權能的觀點加入災難社會工作時，如何落實？一些學者提供一些建議：

Enarson & Morrow（1998）指出，以增強權能取向的災難社會工作實務，應該考慮：在災難發生時撤離家園，臨時安置時期，重建時期，都應該詳細考慮不同狀況女性的獨特需要，例如：有嬰幼兒子女的女性，在撤離家園時，是否有交通上的特殊需要？在臨時安置與重建階段，又有何獨特需要？年老女性，在撤離，臨時安置與重建時期，其獨特的需要為何？僅有臨時工作的女性，在撤離，臨時安置，與重建時期，其獨特的需要為何？需照顧家中身心障礙成員的女性，在撤離，臨時安置，與重建時期，其獨特的需要為何？除此之外，也必須考慮，天然災害對女性的長期性的影響。

天然災害發生之後，每一位受災者復原的速度不一樣，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每一個人資源的取得與運用，以及在社會上的位置，生存的技能等因素，有密切的關係。由於女性長期在社會中多數居於弱勢與脆弱的位置，天然災害的經驗容易對婦女產生長期的影響，因此在重建階段，如何增強婦女的權能（empowerment），使婦女能夠得到生活的能力，避免婦女再度成為下一次天然災害的受難者，是災難社會工作實務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方向。Noel（1998）

認為在重建的階段，一個以增強權能出發的社會工作服務，就是所有的服務是以增加案主的能力，減低案主的脆弱，讓案主從依賴外界資源的角色，轉變成為可以自給自足的角色。

Clifton & Gell (2001) 以鉅視的層面並結合女性主義的角度指出，雖然目前世界上有災難發生，就會有許多人道組織相繼的投入救災過程之中，然而這些人道組織都漠視了性別的議題 (gender-blind)，使得女性在災難過後，面臨更為殘酷的生活環境與挑戰；而且如果人道組織的救援或是處遇的方式，仍舊強化女性的傳統角色，那麼，災難過後只會讓女性在社會上的弱勢地位更加嚴重。Clifton & Gell (2001) 解釋到，大家共同同意的是，每一個人都有獲得救助的權利，而不是有某種特權或是特質的人，優先可以得到救援；而救援的目的除了讓災民活命之外，還必須幫助他們減輕苦難 (suffering)，在這樣的前題之下，每一個人都應視其生活條件，生理不同的需要，而得到不同的救助，才能減輕苦難。所以，每一個災民所需要的物資與資源，就必須視個人情況而有不同。

Clifton & Gell (2001) 的另外一個觀點是，在災難的重建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不應該是將女性擺回原來的傳統角色與地位當中，應該要讓女性增強權能，使婦女得到更多的資源與技能，才能在下次災難發生時，女性有更好的應變能力，不再因為自己的弱勢與脆弱，再度成為災難的受害者。這一個觀點對於幫助女性案主免於再次成為天然災害受害者，或是不再長時間遭受天然災害的影響，相當重要。

Kanter (2003) 在如何增強農村女性案主權能的論述中，也提出了和 Clifton & Gell (2001) 相同的看法。作者強調，除了要教導女性學習賺錢的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教導她們處理金錢，運用金錢，讓金錢與經濟獨立變成一生可以自己處理的議題，讓處理金錢與經濟獨立能力變成案主的權能，這才是讓案主真正轉變成為有權能的人的過程。

Clifton & Gell (2001) 的第三個建議則是，人道救援組織的政策與工作人員，都應該培養性別敏感度，甚至在組織文化上，就應該強調兩性平等。目前的人道救援組織強調科層體制，以男性為主，行動取向，權威式的組織結構，容易讓工作人員忽略女性的需要，因此，在平常的組織文化中，就應該要加入同理，性別敏感度的部分，才能幫助工作人員不再只是內化男性需要為主的思考。Enarson & Morrow (1998) 指出為了達成了解不同性別需要的目標，災難社會工作人員在訓練的過程之中，就應該培養性別方面的敏感性，了解不同性別受災者的獨特需要，同時在平常的組織團隊中，就要注意性別平衡，才能真正落實並注意性別的議題。

Toscani (1998) 則提出一個相當完善的協助受災女性的架構，在社區的層級上，要發展方案訓練女性案主的生存技能，教導女性案主收集並分辨可用的資源與訊息，組織婦女的力量與知識處理社區中的健康，房屋，食物等議題，為婦女提供災難後的心理建設；在管理與技術的層級上，要確保女性有參與的名額，讓女性的需要得以被考慮，也必須讓管理層次的人員具有不同性別需要的分析能力，讓現

有的方案納入性別的考量；在政治與政策的層級上，要確保女性的參與機會，讓女性發聲，在保險等政策上，要確保女性的需要。

簡言之，當女性的需要納入考慮時，災難社會工作就有了不一樣的重點，這是社會工作實務工作者必須深思的。

結論：對實務工作的啟發與建議

由於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社會化的歷程，使得女性成為弱勢與脆弱的人口，意即，女性所處的社會環境與長期的社會化歷程，使得女性缺乏足夠的資源與權力，在面對天然災害襲擊的時候，無法有足夠的資源面對，甚至長期處於天然災害的影響，而無法復原。實證研究都指出，女性天然災害受害者有不同於男性的需要，如何將不同性別的需要，納入實務工作與政策制定之中，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總結上述的討論，研究者認為對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的社會工作服務，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為災害剛發生的撤離及臨時安置階段，另外一個則是重建階段。在天然災害剛發生的撤離及臨時安置階段，需考慮並照顧不同屬性，不同年齡女性的需要，例如：行動方面有何特別需要？日常用品有何特別需要？健康方面，有何特別需要？

在重建的階段，增強權能就成為最為重要的取向。在重建的階段，社會工作實務與政策決定可以考慮以下的步驟：

1.組成受害婦女的互助團體，一方面進行心理上與家庭關係的支持與諮商，另外一方面則可以進一步轉化團體的力量，

讓女性發揮所長（insider knowledge），協助自己及社區復原，達到相互增加權能（mutual empowerment）的目的。

2.除了提供訓練方案，協助受災婦女學習生存的技能，利用資源的能力之外，更應該培養受災女性如何將處理金錢，處理資源與訊息，讓經濟獨立，訊息判斷，與資源運用等的能力轉變成為權能，脫離弱勢與脆弱的角色。

3.從地方到中央各個層級的救災團隊中，都應納入女性代表，讓女性的需要能夠充分納入考慮。

4.社會福利政策應該將不同性別的需要，納入救助以及補助的政策考量當中。由於現階段女性較多位居於脆弱的位置，所以受災女性的需要，應被重視並納入考慮。未來的研究也應該多從事這一類型的研究，提供政策制定者參考。

5.平常對於天然災害的第一線救助者，就應該在職訓練課程中，加入性別敏感度，或是不同性別需要分析的課程，如此一來，當天然災害發生時，不同性別災民的需要，就能被充分考慮。

6.如何減少造成女性弱勢脆弱的社會經濟因素，則是實務工作者與政策制定者長期的工作目標。

後記

當我正在寫本篇論文的時候，南亞發生規模 9.0 的大地震，引發空前的海嘯，使得數個以觀光業為主的地區，變成人人卻步的煉獄。當國際組織大量進入救災，媒體一再的出現哭泣，無助的婦女、老人的面孔時，我所想到的是，當媒體的熱度過後，國際組織撤退，生還者將繼續走向

他們未完的人生，然而當地的旅館，商店已經損壞關閉，觀光地貌改變，觀光客不再出現，平常賴以爲生的工作已經蕩然無存，他們如何走下去？這些問題讓我更加肯定本文的論點，當災難進入緩和與重建

的階段，增強權能是最爲重要的社會工作服務重點。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參考文獻

- 行政院主計處（民 93）九十三年中華民國統計年鑑，Retrieved from: www.dgbas.gov.tw/dgbas03/bs7/yearbook/sc.htm.
- 臺中縣政府社會局（民 93）臺中縣政府社會局回覆監察院有關敏督利颱風七二水災善後處理及安置情形。
- 李維庭（民 89）經歷九二一：災民安置所的心理重建經驗，應用心理研究，6，213—250。
- 李臨鳳（民 92）社政體系災害救助與危機處理策略，社區發展季刊，104，56—65。
- 林秀芬，馬小萍（民 93）絕處逢生—探討九二一地震喪偶女單親災變後之社會支持過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9，39—84。
- 林萬億（民 91）災難救援與社會工作：以臺北縣 921 地震災難社會服務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7，127—202。
- 林耀盛（民 89）存活者的心理治療，厚生，9，24—25。
- 莫藜藜，李易蓁（民 89）災服務中之外展社會工作初探—以九二一震災為例，中華醫務社會工作學刊，8，17—36。
- 畢恆達（民 88）災難與性別，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3，1—4。
- 畢恆達（民 89）環境災害的社會心理衝擊，土木技術，3（3），63—71。
- 陳正元（民 88）災難救援中社工員的心理衝擊與兩難—從東星大樓倒塌事件救災過程分析，社會福利，28—32。
- 楊孝滌（民 92）社會福利的危機處理策略，社區發展季刊，104，66—76。
- Anderson, K. M., & Manual, G. (1994)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ported stress response to the Loma Prieta earthquake. *Sex Roles*, 30(9/10), 725-733.
- Bari, F. (1998) Gender, Disaster, & Empowerment : A Case Study from Pakistan.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10. P.125-131. Westport, CT : Praeger Publishers.
- Bolin, R., Jackson, M., & Crist, A. (1998) Gender Inequality, Vulnerability, & Disaster : Issues in Theory & Research.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2, 27-44. Westport, CT : Praeger Publishers.
- Chen, Sue-Huei, Hung, Fu-Chien, Lin, Yaw-Sheng, & Tseng, Hsu-Min (2002) Trauma & Psychosocial Aftermath among High-and low-Exposure Adults Three months post the 921

- Chi-Chi Earthquake in Taiwa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4(2), 167-188.
- Clifton, D., & Gell, F. (2001) Saving & protecting lives by empowering women. *Gender & Development*, 9(3), 8-18.
- Cox, H. (1998) Women in Bushfire Territory.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11, 133-142. Westport, CT : Praeger Publishers.
- Enarson, E. (1998) *Through Women's Eyes : A Gendered Research Agenda for Disaster Social Science*. *Disasters*, 22(2), 157-173.
- Enarson, E., & Morrow, B. H. (1998)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 Through women's eyes*. Westport, CT : Greenwood Publishing.
- Enarson, E., & Morrow, B. H. (1998) Conclusion : Toward Gendered Disaster Policy, Practice, & Research.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225-231. CT : Praeger Publishers.
- Enarson, E., & Scanlon, J. (1999) Gender Patterns in Flood Evacuation : A Case Study in Canada's Red River Valley.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Review*, 7(2), 103-124.
- Finlay, C. C. (1998) "Floods, They're a Damned Nuisance" : Women's Flood Experiences in Rural Australia.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12, 141-149. Westport, CT : Praeger Publishers.
- Fordham, M. H. (1998) Making Women Visible in Disasters : Problematising the Private Domain. *Disasters*, 22(2), 126-143.
- Fordham, M., & Ketteridge, Anne-Michelle (1998) "Men Must Work & Women Must Weep" : Examining Gender Stereotypes in disasters.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6, 81-94. Westport, CT : Praeger Publishers.
- Fothergill, A. (1998) The Neglect of Gender in Disaster Work :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1, 11-25. Westport, CT : Praeger Publishers.
- Fothergill, A. (1999) Women's Roles in a Disaster.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Review*, 7(2), 125-143.
- Fothergill, A. (2003) The Stigma of Charity : Gender, Class, & Disaster Assistanc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4(4), 659-680.
- Fothergill, A. (2004) *Heads above Water : Gender, Class, & Family in the Grand Forks Flood*. New York : SUNY Press.
- Guha-Sapir, D. (1997) Women in the Front Line.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key players in disaster preparedness & relief. *UNESCO Courier*, 50(10), 27-29.

- Hanmer, J., & Statham, D. (1989) *Women & Social Work. Towards a Woman-Centered Practice.* U.S.A. : Lyceum Books, Inc.
- Ibanez, G. E., Khatchikian, N., Buck, C. A., Weisshaar, E. L., Abush-Kirsh, T., Lavizzo, E. A., & Norris, F. H. (2003)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 Conflict Among Mexican & Mexican-American Disaster Survivor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1), 1-23.
- Kanter, P. (2003) Women's Empowerment Through Home-based Work : Evidence from India. *Development & Change*, 34(3), 425-445.
- Levine, C. (2004) The Concept of Vulnerability in Disaster Research.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7(5), 395-402.
- Miller, J. B. (1986)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Boston, MA : Beacon Press.
- Morrow, B. H. (1999) Identifying & Mapping Community Vulnerability. *Disasters*, 23(1), 1-18.
- Noel, G. E. (1998) The Role of Women in Health-Related Aspect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 A Caribbean Perspective.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20, 213-223. Westport, CT : Praeger Publishers.
- Reyes, R. R. (2002) Gendering responses to El Nino in rural Peru. *Gender & Development*, 10(2), 60-69.
- Saleebey, D. (1997)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N. Y. : Longman.
- Sefansky, S. (1990) Pediatric Critical Care Social Work : Interventions with a Special Plane Crash Survivor. *Health & Social work*, 15(3), 215-230.
- Simon, B. L. (1994) *The Empowerment Tradition in American Social Work. A History.*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ehlik, D., Gray, I., & Lawrence, G. (2000) Gender & Drought : Experiences of Australian Women in the Drought of the 1990s. *Disasters*, 24(1), 38-53.
- Toscani, L. (1998) Women's Roles in Natural Disaster. Preparation & Aid : A Central American view.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19, 207-211. Westport, CT : Praeger Publishers.
- Waite (2000) How is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Gendered?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the Collectives of Suleimaniyah, Iraqi Kurdistan. *Disaster*, 24(2), 153-172.
- Zakour, M. J. (1996) Disaster Research in Social Work.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22(1).